

# 文化革命中的新華夏中心主義

• 劉青峰

## 對「排外說」的質疑

1966年8月，中國各大城市紅衛兵高唱「破四舊」戰歌，浩浩蕩蕩走上街頭，他們焚書砸廟，封閉教堂，勒令民主黨派解散，打老師鬥家長，掀起「紅色風暴」。文革後，人們談起紅衛兵行為時往往拿他們和1900年義和團的「排外」相比。

如果說義和團可以算作排外的話，那麼就很難用此來解釋紅衛兵行為。「排外」有閉關鎖國和全盤排斥外國文化的雙重含義，而文革時期並不是籠統地排斥一切外國事物。1968年文革高潮之際，美國發生了槍殺馬丁·路德金事件，毛澤東馬上發表聲明支持黑人鬥爭，隨即中國有29個城市舉行盛大示威遊行。舉國上下支持外國的某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鮮有的事。

事實上，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全民關注和它對世界的精神影響，恐怕沒有一個時期能和文革時的毛澤東中國相比。到1967年7月《毛澤東語錄》已在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幾乎成為第三世界反帝的聖經。1968年，巴黎大學生模仿中國紅衛兵，上街遊行示威，佔領校園；切·格瓦拉運用毛澤東戰術在南美打遊擊戰，中國被稱為世界的延安。

甚至也不能用一般的民族主義來解釋紅衛兵的行為。因為，民族主義在排拒外來文化的同時，還強烈地捍衛本民族傳統文化，而紅衛兵不僅反西方，也反中國傳統文化。統計數字顯示，文革時期是中國政府無償外援最多的年代。1968年，中國對外援助費用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高達6.2%<sup>①</sup>。而當年教育經費只佔國民總收入的1.96%，佔財政總支出的6.25%<sup>②</sup>。也就是說中國用於六、七億人民的教育經費與援外經費幾乎一樣多。這顯然是違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民族主義。

很明顯，文化革命時期中國政府和紅衛兵的行為包含了排外反西方和無償支持世界革命的世界主義這對立的兩極。表面上這兩極是靠毛澤東關於無產階

文化革命時期中國政府和紅衛兵的行為包含了排外反西方和無償支持世界革命的世界主義這對立的兩極。透過革命詞句，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中國傳統中特有的民族主義形態——華夏中心主義。



圖為1968年5月巴黎學生與警察在街頭對峙。

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統一起來，但透過革命詞句，我們不難發現其深層結構，這就是中國傳統中特有的民族主義形態——華夏中心主義。

## 新華夏中心主義

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是由費正清等學者提出來的，而我們這裏是指那種將中國文化和制度視為最優、並以此來理解中國處於中心位置的世界秩序。中國士大夫相信，存在着一種超越種族、文化之上的全人類共有的價值，即普遍的天道。外國的文化制度之所以應堅決排斥，並非因為它是外國的，而是因為它違背了普遍的天道。

如果我們先撇開文革中反帝反修的具體內容，僅考察其行為結構，就會發現它和華夏中心主義的某種類似性。很明顯，紅衛兵反對西方並不是出於簡單

的捍衛本民族的利益。在紅衛兵眼中管它是外國的、中國的，只要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通通在掃除之列。排外的根據並不是民族主義，而是一種類似華夏中心主義的普遍天道。眾所周知，文革中毛澤東思想已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而中國是體現這種普遍天道的唯一國家。正如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把中國視為世界普遍道義的體現一樣，文革時的中國也成為新的普遍道義的代表。顯然，道義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和現實革命的唯一正統理論，因此中國也立即獲得世界革命中心的稱號。1968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特里奧雷時，提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根據毛澤東對三個世界的劃分，美蘇兩霸是第一世界，西歐日本等是第二世界，最革命的是被壓迫的第三世界。如同藩夷分佈在中國四周那樣，三個世界按其革命性強弱依次分佈在世界革命中心——中國的周圍。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某種類似於華夏中心主義及其指導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排列。由於文化革命時期「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具體內容（即道德含義）不同於傳統儒家的道德追求，它只是形式上的類似，所以我們將其稱為新華夏中心主義。

華夏中心主義存在的必要前提是，中國的文化制度被視為最優。一旦這一前提不成立，華夏中心主義也就會解體。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盛行於1895年之前，甲午戰敗後，士大夫開始普遍意識到西方和日本的制度優於中國。這時，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到新文化運動時形成了以近代民族主義為主導的多元的民族主義<sup>③</sup>。50年代以後，經過一系列演變，到文革時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毛澤東思想再次被認為是世界第一，新華夏中心主義隨即形成。但是可以說它形成的關鍵，是和中蘇決裂、反修防修理論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在紅衛兵眼中管它是外國的、中國的，只要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通通在掃除之列。排外的根據並不是民族主義，而是一種類似華夏中心主義的普遍天道。中國是體現這種普遍天道的唯一國家。我們將其稱為新華夏中心主義。

## 中國如何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63年6月7日，《人民日報》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為題刊載了給蘇共中央的覆信，拉開了中蘇意識形態大論戰的序幕。此後在一年左右時間內中共中央發表了九篇文章，這就是被稱為反修防修綱領的「九評」，影響極大。通過這場辯論，極大地改變了評判哪一國最優的價值標準。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共已放棄了50年代初期生產力優先的取向，而變為革命立場優先。於是，蘇聯的共產主義被譏笑為赫魯曉夫式的「土豆燒牛肉」，是完全沒有精神的庸俗物質主義。雖然中蘇論戰的基本動因應該說是國家利益衝突和民族主義，但是這場爭論的後果卻推動了新華夏中心主義形成。至少中國共產黨是這樣教育全體黨員的：蘇共變質，蘇聯再也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國共產黨從而獲得了繼承馬列主義正統地位，毛澤東思想也成為人類普遍道義的代表。這樣，形成新華夏中心主義的前提已經完備。

粗略分析一下「九評」，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和國際共運中自我定位的變化。「九評」的前四評是分析蘇共如何背叛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接着論述中共如何堅持原則和蘇共鬥爭，其中特別強調的是捍衛馬列主義

的純潔性。在最後一評即第九評中清楚點明，蘇聯變修原因是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而導致「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資本主義復辟；並據此歷史經驗總結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來，馬列主義代表天道，而蘇聯是列寧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理所當然地佔有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心位置。中蘇論戰，「九評」的發表，把這一中心位置轉移給了中國共產黨。轉移的理由也完全是基於意識形態正統和純潔性方面，中國共產黨已取而代之成為馬列主義這一天道的代表，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馬列主義的最新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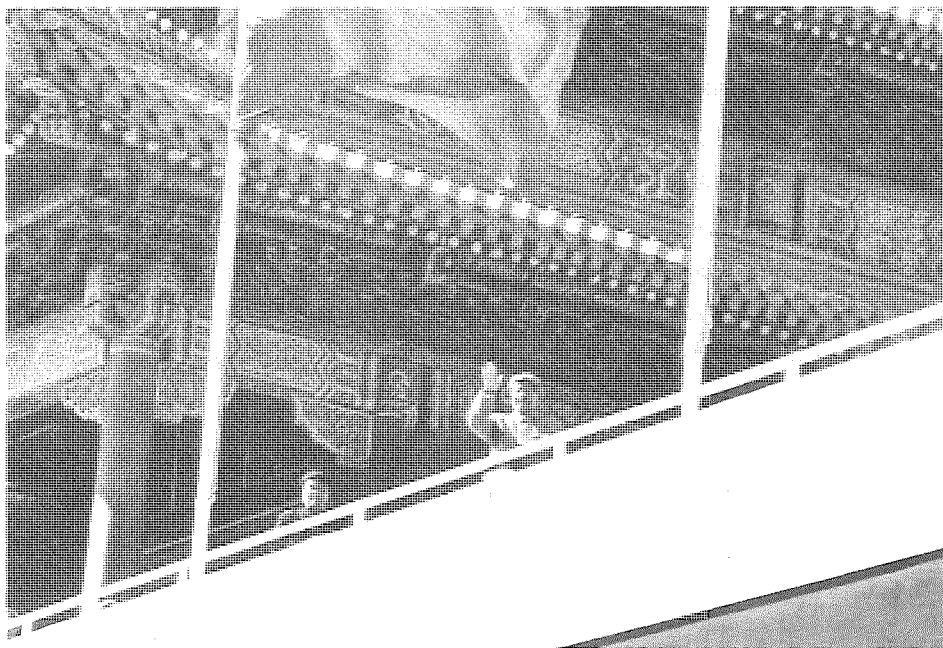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的最後障礙消失。這時，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最高天道的提出者，而且是「新天道」的實現者。紅色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革命中心。

隨着中蘇大論戰的進行，中國輸出革命的思想也日益突出。1965年9月3日，林彪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一文中，把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推廣到世界。文章說：「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sup>④</sup>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觀念呼之欲出。同年10月，中國便公開派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鐵道、後勤等部隊到越南抗美援朝。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的最後障礙消失。在中蘇論戰時，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已形成，但是這一新「天道」還沒有找到廣泛的實踐者。文革開始，毛澤東才覺得找到了反修防修之路。這時，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最高天道的提出者，而且是「新天道」的實現者。紅色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革命中心。

在1966年8月12日發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正式把毛澤東思想稱為「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列主義的新階段。這一說法成為紅衛兵造反的強大精神資源。1967年在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時，毛澤東用文化革命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觀點，被正式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同一天，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把中國稱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sup>⑤</sup>。

《九評》以後，毛澤東思想成為人類普遍道義的代表。



## 改革開放與新華夏中心主義的衰落

1965年到1968年是毛澤東思想中新華夏中心主義最盛行的時期。1968年後，隨着文革的政治烏托邦破滅，新華夏中心主義也開始動搖。1968年5月18日，毛澤東批評一份文件使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sup>⑥</sup>。他認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此後中共中央通知今後一律不再用「世界革命中心」詞句。文革中期以後雖然毛澤東思想中的道德價值一元論支配的華夏中心主義心態並沒有真正改變，但對中國是否是「新天道」的最高體現已不像以前那樣有信心了，只是把產生毛澤東思想的原則——馬列主義與本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看作放之四海而皆準。

1978年12月舉行了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文革左傾，再次明確以生產力發展為社會主義是否成功的標準。1981年六中全會又正式發表了否定文化革命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被放棄。隨着中國代表「新天道」的神話徹底粉碎，新華夏中心主義也煙消雲散。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對外關係有兩個重大變化，一是隨着改革開放，全國又掀起了學習西方科技的高潮；另一個是中國停止了對第三世界的無償援助。這兩個變化，恰好對應着華夏中心主義心態改變後的兩個方面。首先，改革開放承認中國有必要學習西方，也就放棄了中國制度最優的心態。整個80年代，「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的呼聲，不絕於耳。毛澤東在1956年講「開除球籍」時充滿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sup>⑦</sup>，而80年代「開除球籍」問題的討論則充滿對中國落後的憂慮。其次，這一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變為以本民族發展為第一，也不熱衷於輸出革命了。從前不計較民族利益、為援越付出巨大代價的中國，現在對越南忍無可忍，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爆發了1979年2月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

新華夏中心主義在文化革命中如潮水般湧起，又隨着文革結束而消失得無影無踪，它反映出民族主義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有着相當大的盲目性，依然受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深層結構的制約，有待人們去反思，並將其引向開放的理性的渠道。

新華夏中心主義在文化革命中如潮水般湧起，又隨着文革結束而消失得無影無踪，它反映出民族主義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有着相當大的盲目性，依然受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深層結構的制約。

### 註釋

①⑥⑦ 馬齊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324；頁311；頁117。

② 厲以寧主編：《教育經濟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104中的表5-5。

③ 金觀濤：〈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結構的演變〉，見本期《二十一世紀》。

④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人民日報》（1965年9月3日）。

⑤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